

Gail Caldwell

LET'S
TAKE
THE
LONG
WAY
HOME

「美」盖尔·考德威尔 著
许思悦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Gail Caldwell

LET'S
TAKE
THE
LONG
WAY
HOME

一
路
两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12-3602 号

Gail Caldwell

LET'S TAKE THE LONG WAY HOME

Copyright © 2010 by Gail Caldwell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Zachary Shuster Harmsworth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路两个人/(美)考德威尔(Caldwell, G.)著;
许思悦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ISBN 978-7-02-009211-6

I. ①一… II. ①考… ②许… III. ①回忆录—美国—现代 IV. ①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01912 号

特约策划:邱小群
责任编辑:马爱农
封面设计:董红红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87 千字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4.5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12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211-6
定 价 16.00 元

这是个很老很老的故事：我有过一个朋友，我们分享一切。然后她死了，我们也分享了她的死亡。

她走后一年，我以为我已经熬过了最初的痛苦造成的疯狂。我走在剑桥水库的小路上——夏洛琳和我在这儿遛了好几年狗，那是一个冬日的午后，那地方一片空茫——路上有个弯道，我身前身后皆是寂寥无人。凄凉之感猛地袭上我的心头，我的膝盖甚至一度不能动弹。“我现在应该干吗？”我大声问她，我已经习惯了跟我已逝的最好的朋友对话，“我应该继续向前吗？”有她相伴，我的生活曾如此有意义：好几年了，我们每天都玩那种抛接游戏，游戏虽然简单，却暗示着亲密的关系。一个球，两副手套，一抛一回的同等快乐。现在我站在没有她的场地上：一副手套，游戏终止。悲伤会告诉你，在你独自一人时你是谁。

我仍能看见她站在岸边，颈上围着毛巾，手里拿着锻炼后的那支烟——甜妞和运动健将融为一体，她那划船手的手臂，与她不知在何处找到的粉色泳衣，形成了一种颇具反抗意味的对比。那是一九七七年的夏天，卡洛琳和我决定交换运动技能：我给她上游泳课，她教我怎么划船。这种安排解释了我为什么蜷在我最好的朋友的赛船里，看上去不像是划船的，倒像是只喝醉了的蜘蛛，那船最宽的地方也不过十二英寸，窄得就跟针似的。我们在新罕布夏州的乔克鲁阿湖，那是怀特山旁未被污染的一英里长水域。除了我们俩，只有我们的朋友汤姆一个人目睹了我的这次壮举，他是跟我们一起来度假的。

“太棒了！”每次我徒劳无功地微微动一下，卡洛琳都会冲我喊。我紧紧捏住船桨，攥得指节发白。卡洛琳三十七岁，已经有了超过十年的划船史；我大约比她大九岁，这辈子都在游泳。我发现自己具备抓住划桨要点的体力要素。可我多么想模仿卡洛琳，她的划桨动作精准得就像节拍器，我并未意识到光是坐在船里，就如同要在飘浮的树叶上保持平衡那样不稳。我怎么会让她说服我做这事的？

通常划船新手会在比卡洛琳的“凡杜森”号宽两倍，也重两倍的船里学习。后来她坦白说她等不及想看我翻船。但是当她们站在水

边,大声地冲我指挥时,却带着一种不容辩驳的热情,充满了鼓励之意。我的成功稍纵即逝,她不如干脆用秒表计时。船桨是我仅有的支撑,我开始向水面倾斜,最后左摇右晃地坚持在六十度的位置,这还不是因为我有任何的平衡感,而是因为我已经僵了。汤姆在码头捧腹大笑,我斜得越厉害,他笑得越大声。

“我要翻下去了!”我哭喊道。

“不,你不会的。”卡洛琳说,她就像是输了比赛的教练毫无笑意,“不,你不会的。把手放在一起。保持别动——不要看水,看着你的手。现在看着我。”她的话语让我获得了足够的慰藉和指引,终于摆正船身。我在跳出船扑向湖水之前,终于在平静的水面上划了五六下。等我从水里出来,过了几秒,在十码外的地方,卡洛琳开始大笑,同时给了我欣喜的一瞥。

我们三个是八月去的乔克鲁阿。汤姆登了一则夏天求租的广告:“三位作家带着狗,寻找靠近水和徒步小径的房子。”他的搜寻结果是一栋摇摇欲坠的十九世纪农舍——我们之后几年还会回来。那地方被延绵起伏的草地环绕,拥有一切我们渴望的东西:宽敞空旷的房间里铺着老式的加衬心的床罩,还有手纺车;为野营者准备的厨房,外加一个巨大的石壁炉;高高的窗子眺望着怀特山。几百码外就是湖。早上,有时是夜晚,卡洛琳和我会走向水边,留下狗们透过前窗远望。她从湖的一头划船到另一头,而我绕湖游泳。我是水獭,她是蜻蜓。我偶尔停下来,欣赏她的翱翔,来来回回足有六英里。有时

她把船靠向湿地，仔细观察我在水里的翻滚转身。那时我们已经做了两年朋友，我们有一种存在于姐妹间，或者说是青春期少女间的竞争精神——我们都希望拥有对方的过人技艺。

那地方的金色色调，以及它所施予我们的单纯时光——河边漫步，野花，大黄馅饼——都高于卡洛琳的期待：她觉得大多数的度假都是不情不愿地到镇子外去。我稍微再有点冒险精神，希望自己能像空降一般开始夏日旅行，不用为狗或是购买四十磅的食物焦躁不安。卡洛琳和我都是独居的作家，我们都在一件事上难以妥协，那就是打乱我们的常规：每天在马萨诸塞省的剑桥散步，我们共享或是相互比较的锻炼法则，饮食，电话，以及我们称之为“我们的小小生活”的独自工作时间。“对巴黎的评价言过其实。”卡洛琳喜欢这样断言，部分原因是为了逗我发笑。一天夜里，她遇见我的一个朋友，他对她的书很了解，问她是不是大部分时间都在纽约度过。“你开玩笑？”她说，“我甚至都没去过萨默维尔。”我们依赖于这种神圣不可侵犯的熟悉，离开镇子只是为了把旅行从单子上勾去，然后继续回到日常生活的喜怒哀乐中来。

我有一张照片，记录下了在乔克鲁阿的某一个夏天。照片里的主角是我和卡洛琳的狗克莱蒙蒂娜和露西尔。它们在窗旁的椅子上望着户外，光线映衬出她们的轮廓。这是一副经典的狗照片，捕捉住了那种警惕又不失忠诚的感觉：两条紧挨着放的尾巴，两个尽忠职守的动物。过了好些年，我才发现在照片的中景里，透过窗子你能依稀

辨认出两个小而又小的人影——那是正从小山上下来的卡洛琳和我的轮廓。我们一定是要去湖边，而那两条狗熟悉了我们每日的路线，早已按时上岗。卡洛琳的摄影师男友莫雷利觉察到了这一镜头中的美，摸出了相机。

她死后一年，我看到了这张照片。这似乎就像是画作里暗藏的线索——一座消失之后才会被发现的神秘花园。乔克鲁阿仿佛笼罩在近乎完美的纯净光芒里，我记得：那天夜里卡洛琳跟汤姆掰手腕差点就赢了他；那只把我赶上餐桌，惹得她在一旁大笑的耗子；我们设立的“最牛野营者”奖项（她总是赢）。还有那天，卡洛琳生气了，因为我把她留在一艘移动尤为缓慢的独木舟上独自划向雾中，那些蚊子我不愿再想起。如同大多数记忆都会被最后的章节抹上色彩，我的记忆真切地带着伤痛的重量。关于悲伤，你永远不知道思念一个人其实是最简单的部分。

第一个夏天过后的五年里，我们一起划船，并驾齐驱。我们都住得离查尔斯河不远。那是一条如迷宫般错综复杂的水域，蜿蜒九英里穿绕波士顿，从牛顿北边经过剑桥一直到波士顿港，曲折迂回，水面却平静无澜，是划船手的圣地。卡洛琳身材矮小，却能压得住超过她体重的分量，我管她叫“野蛮妞”，或者“小野兽”。我们从相隔几英里远的船库把船划出，我能在几百码外辨认出卡洛琳的划船动作——我会在埃利奥特桥或是哈佛边上的威克斯行人桥附近等她，准备连珠炮似的向她发问，什么体形、速度如何，或是把大拇指搁在

哪儿。要是她比我早出来几小时，她一回家就会火速发出没有标点的电子邮件：“水面平静加快速度。”从四月到十一月，我们或一起或单独地划过了上百英里。在最初的那两个夏季，她忍受了我讨论划船理论的电话。“我想谈谈推力。”我用几乎疯狂的紧张语气说，或者是“你知道人的脑袋有十三磅重吗？”“嗯……哼……”她回答道。我立刻听见背景传来一阵轻柔的咔嗒声——她又开始跟电脑玩纸牌游戏了，这相当于她在电话里打了个哈欠。我们在一天临近结束时一起遛狗，比较手掌和手指上的老茧（出色的划船手经过战斗后特有的伤疤），就像两个小姑娘在比较晒后的肤色或是那种带着小吊坠的手链。因为她在划船方面技高一筹，而且向来如此，我接受她的骄傲自得，发誓在游泳池里还以颜色。一年圣诞节，我送了她一张一九四〇年代的照片，两个女划船手在英国牛津划着双人船。她把它挂在床边的一堵墙上，下面是一条裱着框的横幅，上面写着“热情是有效的火焰”。

这两张照片现在都挂在我的卧室里，就在那张狗的照片的旁边。卡洛琳死于二〇〇二年六月初，那时她四十二岁，七周前被确诊为肺癌第四期。她入院后的最初几周试图写下遗嘱。她想让我接手她的船，就是那艘我曾用来学划船的老“凡杜森”号，这么些年她一直悉心照料它，仿佛它是一匹备受宠爱的马。她说这些的时候我坐在她的病床上，那是关于死亡的最初一次谈话——当你知道即将发生什么，正竭尽全力想杀出一条路时。我告诉她要我接手那艘船，就必须让我按照划船的传统，把她的名字刷在船头；也就是卡洛琳·纳普。没

门,她说,眼中闪过教我划船那天的光芒,你得叫它“野蛮妞”。

悲伤宛如光谱,甚至能改变树木的色彩。但当人们接触到它之前,有一种盲目的、因武断而错误的假设,也许会让我们跌跌撞撞地度过时日。人们总是认为,演出永远不会结束——或者说那种缺失,当它真的降临,会指向道路的最尽头,而不是中间。卡洛琳死的时候我五十一岁。其实到了生命中的这个阶段,你参加过的葬礼,已经足以让你熟谙《传道书》中的诗节。但得知卡洛琳生病的那天——那天医生用了那些令人窒息的字眼“我们会减轻她的痛苦”——我记得我走在路上,四月里明亮的街道闪耀着生命的光彩,我因为震惊而变得仿佛不谙世事,我大声地自言自语道:“你以为自己能躲过去,是吗?”

我的意思是也许我能逃脱那种残酷的、令人无法忍受的失去,而这种失去并不像吸毒、自杀、年老那样,带着一种刻意或是自然的退场标志。那些事我全都遇见过,总是有类似的悲剧媒介(要是他服用了锂;要是他没有走私可卡因)或是某种无奈接受(她活得挺长了)。但是没有一个我爱的人——我数遍了我生命中必不可少的支柱——突然逝去,那么年轻,心中满是不愿离去的决心。没有人拿到过可怕的化验报告,掉头发,被告知安排好自己的后事。更重要的,不是卡洛琳。不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的小小妹妹,那么多年来她一直跟我开玩笑说再过几十年,等我老弱得没法烧饭,她会给我送汤来。

从一开始,我们之间就有一种无法言喻,甚至有些玄妙的东西存

在,不认识我们会误以为我们是姐妹或者爱人。有时候朋友们也会叫混我们的名字:卡洛琳死后一年,我们俩共同的一个朋友在我们曾经一起散步的水库“鲜水湖”边叫我“卡洛琳”,然后为了自己的口误泪流满面。友谊宣布了它的深厚,是因为那些显而易见的情感,但同时也因为我们或暗藏或外显的相同之处。我们的生活故事在两条相呼应的轨迹上向彼此交错,这是最初的联系。找到卡洛琳就好像刊登了一则个人广告,寻找只存在于幻想中的朋友,然后她出现在你家门口,却比你期望的更有趣更精彩。分开时,我们各自都是缺乏安全感的酒鬼,心怀抱负的作家,以及爱狗人士;在一起,我们成了一个小小的集合体。

我们有许多梦想,其中一些很可笑,都是些打算享受时间奢侈恩赐的人分享的秘密代码。有一个是我们打算在西马塞诸塞州开编织中心,在里面养边境牧羊犬和威尔士短腿狗。我们那时都太老了,养不动大狗和难以驯服的家伙。我们坚信,边境牧羊犬会训练威尔士短腿狗,而后者会变成我们所希望的那种“口袋狗”。这个编织的念头来源于我们没完没了的谈话中的一次,谈话的主题是我们是否正确地活着——周而复始的对话,涉及内容或严肃(写作,独处,寂寞)或平淡(对时间的浪费,都市生活的愚昧,垃圾电视)。“哦,别担心。”有一天卡洛琳问我是不是觉得她在重播剧集《法律与秩序》上花了太多的时间,我说,“想想吧——如果我们活在两百年前,就会玩玩纸牌,或者搞搞编织,而不是看电视,我们也会为那而担心。”长长的停顿。“什么是编织?”她不好意思地问,就好像那种古老的蕾丝制作工

艺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变成了某种暗语——“编织”是浪费时间的文字代码,我们或是其他任何人都了然于心。

这一切犹如旧物堆里埋藏着的标志,在她死后,突然间一阵痛苦的疾风卷携着向我涌来:我记得试图向认识我们的人解释编织中心,却意识到那听上去多么可笑,不禁流下泪来。当然了,没有人能真正理解编织中心。如同所有亲密关系的代码,它拒绝被翻译。而它之所以那么有趣的部分原因,就在于它只属于我们俩。

我们之所以喜欢划船的一个因素,是它近乎于不可思议的美感——划过水面的最高点,在闪烁的波光中归于平寂。她死后的几天,我梦见我们两个一起站在一座黑漆漆的船库里,唯一的光源是我们头上挂着的一排刺眼的蓝色船桨,宛若星座下凡。在梦里,我知道她死了。我向她伸出手说:“可你回来了,是吗?”她微笑着摇摇头。她的脸庞化作一汪忧伤。

一切真的都是从狗开始的。

我在一九九〇年代跟卡洛琳·纳普有过短暂会面。当时她是《波士顿凤凰报》的专栏作家，我是《波士顿环球报》的书评编辑。她的一本专栏合辑刚出版，在一次我快要忍受不了的文学聚会上有人介绍我们认识。“卡洛琳出了本新书！”我们的女主人明快地说，似乎很肯定我们会对对方有所裨益。她走开后，我们互相浅浅一笑，翻了翻白眼。突然我就有点喜欢卡洛琳了——这儿没有什么自我推销。她矜持内敛，仿佛穿着丝质铠甲；修着法式指甲的手握着一杯白葡萄酒，腴腆而又洪亮的嗓音。我们互相礼貌地寒暄了几句，然后分开，各自进行必要的周旋。

我再见到她已是几年之后。她站在剑桥“鲜水湖”水库的鸭塘边上，我们的打扮都低调了许多。我们两个各有一条小狗。我们都认识的一位驯狗师刚跟我提起过卡洛琳。“你认识卡洛琳·纳普吗？”凯西说，“她也有一条小狗。你们会让我想起对方——你们应该找个机会碰头。”

我附和着含糊地嘟囔了几声，心里却并不认同。我记忆里的卡洛琳似乎过于精致，无法与我那时的状态相类同。我有一条一岁大、

六磅重的萨摩耶犬。我头发里掺着杂草，口袋里装着一块冻干了的肝肉四处闲逛。大部分时间里，我沉醉于养狗带来的不受束缚的快乐，并不太在意自己的外表。那个夏末的午后，我在水塘旁偶遇的那个女人，与我记忆中卡洛琳当年的优雅风度大相径庭。她仍旧很腼腆，甚至让我以为她不记得我了。上等礼服的包装变成了运动鞋和胡乱一把抓的辫子，她围着她那跟克莱蒙蒂娜同岁的混种牧羊犬露西尔转来转去，似乎也心无旁骛地只牵挂着她的狗，与我不相上下。

我还知道，出于私下或是公开的原因，几年前的那天夜里卡洛琳拿着的那杯白葡萄酒既是她的魔杖也是她的匕首。说公开，是因为卡洛琳在她的回忆录《饮酒：一个爱的故事》里承认了这一点。那是这本书出版后的夏天，她已经上了无数的脱口秀和专访页，成了出版界梦中的姑娘。按业内人士的话来说，她“秀得精彩”：长长的金色发辫，悦耳的嗓音，而自我克制又暗示着在刻意营造的沉着稳重之后，暗藏着黑色的深流。人们普遍的推断是，大部分作家如果能取得卡洛琳凭此书获得的成功，恐怕就别无他求了。而我的经验和直觉却让我有不同的判断。如果说有某种气质是作家们共有的，那就是他们往往都是害羞的极端自我主义者。他们渴望认知，公众关注的聚光灯便是代价。

这种私下里的共鸣来自于我那几乎尘封于世的过往：十二年前，也就是一九八四年，我戒了酒。然而当卡洛琳带着她的嗜好成为主流时，我却保守地对自己与酒精的斗争讳莫如深。我相信“匿名戒酒

会”(简称“匿戒”)中的“匿名”二字是一块我已经穿了好些年的保护盾。

我们迟疑着互相打了个招呼,而我们的狗却颇为兴奋地彼此熟络起来。“卡洛琳,你还记得我吗?”我问,她微笑着说记得。我说:“天哪,你最近一定够受的——你还好吧?”她吃了一惊,随后松了口气。后来她告诉我,那天她疲惫不堪地到处走着,因为自己的曝光而有些沮丧烦乱。跟我的交谈似乎是一支镇静剂——我更关心她的狗,而不是她的图书销量。她也一样:我们就像是刚生了孩子的妈妈在公园里,交换着被我们庇护的对象的点滴重要信息,而这些只对我们有吸引力。我提起城市北边的米德尔塞克斯丘陵,一块两千英亩、树木繁茂的保护区,我在那儿训练我那任性的雪橇犬不被牵引地奔跑。卡洛琳问我怎么去那儿。路线复杂,我局促不安地解释着,担心她是不是出于礼貌,而我是不是过于啰唆。那地方离这儿半小时路程,交通不便,难觅其踪。只有像我这样真正热衷于驯狗的,才会费心劳神地去找它。

几周后在丘陵,我听见隔着羊圈草地有人在叫我的名字,并看见卡洛琳在另一边向我微笑着挥手。我既惊讶又欣慰——她一定是真正记住了我那如迷宫般的路线图,一路找了过来。我将会发现,仔细关注是卡洛琳拥有的特点之一。几天后,她打电话给我提议一起遛狗;电话没打到,她就又打了一次。作为一个带着德克萨斯热情却内向的人,我总是有点虎头蛇尾。怪不得一个老朋友说我是一个群居的隐士。我渴望某一刻自然发生联系带来的温暖,我也渴望不被打

扰的自由。卡洛琳礼貌地敲了敲通往我内心世界的大门，等待着，又敲了敲，她坚持着。她似乎聪明又热心，而且——这点让我很高兴——我们谈话的时候她告诉我，她在写一本关于人和狗之间感情纽带的书。她像是那种我不介意为之打破我苦行僧般处事原则的人。

那本书叫做《两个是一对：人与狗之间的微妙联系》，几年后出版。卡洛琳将我命名为格瑞斯，而克莱蒙蒂娜变成了一条名叫奥克利的阿拉斯基雪橇犬。在羊圈草地遇见后没过几周，我们隔几天就要一起出去一次。丘陵成了一个常去的目的地。我们在镇子外面的林地里让狗跑上几小时，我们寻遍东马塞诸塞州壮美的森林保护区和草地，并搜索另一些林地。那年秋天我们漫步岸边，冬天踏过防火道，随身带着给狗准备的肝味饼干和给人准备的全麦脆饼，一直走到我们四个都累得发不出声来。狗在延绵起伏的路上互相追赶，我和卡洛琳边走边聊，随着时间的推移越聊越多越聊越深，我们开始管我们整个下午的长途跋涉叫做“分析性散步”。

“走吧，漫漫回家路。”上车的时候她说。然后我们开始在萨默维尔或梅德福的日间交通里缓缓前行，并不急着分开。开车到最后，克莱蒙蒂娜在后座上发出轻柔的呼噜声，车先开到谁家，我们就在谁家屋外坐下继续聊天。然后各自回家继续打电话。

“要是水塘结冰了呢？”初冬的一天夜里我在遛狗结束后说。在那时节，狗还是会猛地扑向水面，不顾其他地沉浸在自己的快乐中。“我担心冰太薄，狗要是追鸟会掉下去。你知道这种事每年冬天都会